

弱者的力量:生命历程视域下留守妇女的 社交媒体赋权

石义彬 邱立

摘要:文章结合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交媒体赋权实践,探讨个体和家庭因素与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的关系。通过深度访谈、田野观察发现:留守妇女既扮演着留守母亲、留守妻子等家庭角色,也扮演着工厂女工、失业人群等社会身份,并在这些多元交织的身份中动态切换。宏观的社会经济、教育政策等结构性因素改变了留守妇女的生活际遇,工作和家庭的职责分工与角色期待共同形塑了她们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青年留守妇女青睐社交媒体休闲娱乐,但会受到工作和性别文化规范的限制,因此被动地减少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中年留守妇女承担主要家庭责任,无暇花费太多时间在社交娱乐上,而倾向于借助工具类社交媒体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留守妇女虽然是弱势群体,但在留守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她们并非是无助的弱者,而是积极地尝试借助社交媒体调节情感、辅助生活以及获得自我认同,并最终丰富了留守生活。

关键词:弱势群体;社交媒体赋权;生命历程;留守妇女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1)05-0013-15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860004)

20世纪末,滑明达利用杰伯纳的文化标识模式(Cultural Indicator Model)和克拉克的正统模式(Legitimacy Model)探讨了大众媒介呈现的5种弱势群体,其中妇女在电视节目中通常以一种狭窄或一成不变的定势方式被进行片面地描画^[1],女性作为媒介弱势群体引发学界关注。在我国,弱势群体多指在社会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格局中由于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的一些人,其中包含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体制外”的人、较早退休的“体制内”的人,相当一部分农民等^[2],均呈现了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等特征^[3]。随着新媒体技术下沉,弱势群体在社交媒体等平台上的积极实践正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以互联网、手机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通信工具成为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赋权器^[4]。但在现实传播中,大众媒体对社会中下阶层较为冷淡,大众媒介对弱势群体的“传媒弱视”,使得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更加“边缘化”^[5]。此外,由于媒介研究中的性别歧视,面向下岗女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妇女等特殊女性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女性群体在媒介研究中再次被“弱视”,使得留守妇女这一群体成为“弱者中的弱者”。互联网时代里大众媒介(如社交媒体)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系需要传播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6]。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第47次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98亿。其中男女比例为51:49,而在2001年,女性网民所占比例仅为38%,整体来看女性网民数量在近年增长迅速;从其他数据来看,城镇网民规模达6.8亿,占网民整体的68.7%。^[7]在以往的媒介研究中,通常将留守妇女归置为农村留守妇女,认为农村相对落后的生活条件(如技术条件)是导致留守妇女媒介素养低下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社会学研究发现当前我国留守妇女群体呈现城镇化聚集、阶段性留守、数量规模减少等特征^[8]。留守妇女的生活际遇正

在逐渐被改写,如举家流动(有的和丈夫随迁流动至城市)、就近就业(有的在原产地附近从事非农兼业劳动)、居住方式调整(大部分和子女、老人居住在一起)等^[9]。因而,留守妇女的生存状态在乡村振兴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宏大背景里值得被重新认识。

一、文献回顾

(一) 留守妇女与社交媒体赋权实践

留守妇女是伴随着农村男性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弱势群体^[10]。吴慧芳等人认为,留守妇女是指丈夫每年在外务工6个月以上,且不在家中居住,而自己长期留守在家乡的55岁以下的农村妇女^[11]。从已有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寻到国内外留守现象的相似之处: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革是造成男性劳务移民的主要原因^[12],外出务工是男性在一定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做出的最优选择的必然结果^[13],也是留守妇女形成的重要原因。目前学界将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定位为弱势群体^[10],将农村留守妇女等同于留守妇女^[14],而忽视了人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妇女的变异性。因此,有关留守人口(留守妇女)的关注,需要扭转到既包括农村又包括城镇在内的留守妇女上来^[8]。相较于社会学者对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状况^[15]、婚姻质量^[16]、思想状况^[17]、权益保障^[18]等生存现状的重点关注而言,基于传播学研究视角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存在欠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研究发现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带有刻板性和片面性,多是以贫苦、弱势、等待救助的形象,远远没有反映出农村留守妇女的真实样貌。董小玉等认为这种留守妇女媒介形象是政治宣传框架和媒介话语分配失衡的产物。^[19]二是关于留守妇女的媒介赋权研究,也是本文采用的研究路径。

赋权的概念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歧视研究,之后这一概念作为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进行干预的手段被引进到社会工作领域,有关著作大量出现。此后,赋权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政治学和传播学领域。赋权的含义多元,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发展过程和介入方式^[20]。从目标追求来看,赋权是指增强个人、群体或社区组织的力量,使之有权力和能力帮助自己和他人改变现状、提高生活品质的过程^[21]。从出发主体来看,一类赋权是从介入者主体出发,弱势群体是被介入的对象,是被赋权的客体。赋权是为了改善因制度结构或利益分化造成的弱势群体生存发展困境,通过引导他们利用积极行动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提升自身的权力和能力,从而使社会权力结构更公正^[22]。另外一类是从弱势群体的主体性出发,认为赋权是指弱势群体通过自身参与或外部推动,激发自身潜能,从而改变自身无权或弱权的社会现状^[23]。因此赋权不仅是赋予弱者权力,更是挖掘和激发个体的潜能。结合已有研究可以认为,赋权所指的“权力”并非狭义上的政治权力,而是从广义上指的一种能力,例如获得所需要东西的能力^[20],因此本文所指向的“赋权”具体体现在弱势群体(留守妇女)获得权力和能力的过程。

新媒体的发展给赋权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张力^[24]。伴随着对发展传播模式的反思和传播赋权理论的推进,人们逐渐认同交流、传播和对话基本构成了赋权的过程。个体通过对话、传播而获得信念,或是通过媒介进行自我言说产生自我效能、增强彼此的认同感^[25],从而改善无权感和少权困境,增强自身的效能感和行动能力。在传播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强调弱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等是当前赋权研究领域的主流模式^[26]。当前国内研究者大多从社会保障、夫妻感情和法律援助等角度思考如何提升留守妇女的生活质量,但还没有意识到新媒体已经融入了留守妇女的生活,影响着她们的家庭、工作以及个人情绪。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介赋权的论文尚且不多。一些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例如微信朋友圈)为留守妇女提供了解孩子的途径,扩大了人际交往范围,改善了夫妻关系,赋予了她们维系其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在健康方面,从媒介了解到的健康信息会引导留守妇女以更加科学、积极的态度关注自身健康。相较于中国留守妇女的媒介赋权研究,西方相关研究更加丰富。西方研究中的留守妇女主要指移民家庭中的留守妻子,与中国的留守妇女有相似之

处,都是与丈夫长期分居两地,要独自承担来自家庭和工作的压力。西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通过鼓励弱势妇女参与和同事、商业伙伴、客户建立的社交网络并从事经济活动,是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赋权的实际来源^[27]。在家庭建设方面,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因社交媒体的存在而发生变化,Goh调查发现,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留守妇女倾向使用网络媒介增强与家人的沟通,通过获取信息了解外面的世界并提升自己在家中的经济地位,最终帮助她们跨越边缘地位^[28]。同时,数字文化参与可以促进留守妇女社会资本的发展,使她们发现有利于自身的社会机会,有助于提升她们的社会地位^[29]。此外,一些女性将博客视为表达内心声音的一种方式,通过博客释放内心情绪,在与他人分享的过程中提高自身认知水平^[30]。

弱势群体是国内外社交媒体赋权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然而对一些弱势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也凸显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因素,例如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要求农村女性需履行好“称职的家庭主妇”(“good housewife”)的职责^[31]。这些传统社会文化规范并没有因为社交媒体上现代女性价值的传播而改变,而是再次被强化^[32]。正如 Wallis 等所言,中国农村妇女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并不能改变性别等级制度,而是再现了社会等级制度。尽管一些新兴的中国农村妇女能够幸运地获得信息、知识等能力,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妇女并未意识到自身依旧处于新媒体技术中的弱势地位^[33]。性别文化方面的因素在国外同样存在,Harcourt 研究指出,网络世界并未祛除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看待女性的方式,在夫妻关系上,外出务工的丈夫无法控制妻子的联系对象,由此引发男性短信跟踪等控制现象的出现^[34]。

此外,生活条件也会影响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实践活动,在肯尼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移民地区,由于技术成本较高,留守在家的妇女会倾向减少移动媒体的使用频率以降低生活成本,同时繁重的劳务工作和家庭责任(如照顾子女和老人)限制了留守妇女社交媒体的实践能力^[35]。总体来看,传播学者对中国留守妇女的研究以媒介形象研究和新媒体使用为主,虽然有研究涉及媒介赋权,但只局限于媒介使用本身,或只考虑了单一因素对留守妇女社交媒体赋权的影响。本文认为,对留守妇女社交媒体赋权的分析应综合考虑社会结构性因素和留守妇女本人的生命历程。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所形成的政策使农村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方面可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受众家境经济条件限制了留守家庭的媒介接触行为,一些调查发现留守人群(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媒介基础知识欠缺。同时,留守妇女的个人生命历程也会对社交媒体赋权产生重要影响。对留守妇女社交媒体赋权实践的考察,不仅要了解社交媒体对留守妇女赋权体现的具体方面,也应该考虑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和个人生活对留守妇女社交媒体赋权实践的影响。

(二) 留守妇女与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可追溯至 20 世纪初的生命史和人生轨迹等概念。20 世纪 60—7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将“生命历程”定义为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的影响,生命历程理论得以阐述并真正定型。其中包括四个经典范式性的主题:①“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②“生活的时间性原理”;③“相互联系的生活”的原理;④“个人能动性”原理。^[36]在理论研究领域,包蕾萍强调了“时间观”,例如“恰当时间”强调年龄、转变和时间的关系;其次,将个体、社会、历史三种层面结合起来,表明生命历程是一定历史情境下在一定社会关系和背景下个体能动选择作用的一个过程。^[37]郑作则则结合欧陆科利范式,强调定性研究方法并偏重对制度层面和生平规划实践的分析。^[38]这也暗合了生命历程社会学的观点,研究者需超越个体和家庭的层次,将生命变化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长期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39]。因此对生命历程的理解,要明确人们的生命不仅随时间的发展而变化,也随着个体经验、家庭事件而变化^[40]。不能忽视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在生命历程的实证研究中,留守人群通常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包括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涉及的议题包括留守经历对个人精神状况^[41]、个体社会化行为的负面影响^[42]等。也有一

些研究提出了留守经历可能对家庭教育产生的积极作用,例如,外出工作的父母出于弥补的心态,更加重视对子女的陪伴^[43]。从生命历程的视角看留守妇女,该群体的留守状态可能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同时受到个体、家庭、社会因素的多重影响。一些调查发现,留守妇女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之间且婚龄时间长,由于长期与丈夫分离,大部分留守妇女对留守生活比较恐惧,缺乏安全感^[44]。基于家庭角色分工,一些女性需要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男性长期外出务工,从而形成拆分型劳动体制^[45]。现阶段一些留守妇女需要照料三代人,照料负担较重。农村经济的相对落后性,相关制度的约束,使留守妇女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需要,较重的家庭负担加重了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程的推进,众多劳动密集型的扶贫车间设在城镇或农村,大量留守妇女开始向城镇聚集,并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传统的“男工女耕”如今正在被改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留守妇女的生活状态^[46]。培养自立自强的品质,提升自身抗逆力等主体性精神开始显现^[47]。因此对留守妇女生活状态的关注,也要留意留守妇女的主体能动性。

在生命历程的社会学研究中,通常忽视挖掘媒介这一凸显的社会变量在影响和改变个体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48]。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生活方式相关,例如消费、教育、婚姻等^[49]。社交媒体的赋权实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目前,有少数研究开始尝试将新媒体使用放入个人生命历程中进行研究。一方面,新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了精神动力,并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规划和未来发展;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生命阶段、工作性质、家庭关系和家庭劳动分工等因素也影响了他们的媒介使用偏好。^[50]已有研究表明,作为弱势群体的留守妇女在不同年龄承担不同的家庭角色,这些变化的角色影响了她们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传统家庭生活中的性别文化规范和非标准化的工作管理机制都反映在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实践活动中。因此本文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关注这些不同的角色如何影响她们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并探讨这些角色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探寻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与社会文化环境、个体能动性、家庭角色之间的相关性。

二、研究问题及方法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认为:个人只有在他们走过的历程中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经历。因此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51]鉴于此,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小城镇地区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同样也是媒介“弱视群体”的理解。以往对留守妇女的媒介研究通常是呈现这一群体的弱势形象,或是将留守妇女等同于农村留守妇女,分析留守妇女的媒介素养,或是探讨媒介接触对留守妇女的影响。很少基于该群体正处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事实中分析她们成为弱势群体的原因。当研究者只关注这一群体的媒介形象,而不结合社会背景与具体的人生轨迹时,就无法从细微之处发现她们的特性。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研究的留守妇女是指年龄在20~59岁,丈夫外出流动后作为妻子留守在户籍所在地的女性。留守人员中的其他成年女性(如外出人员的母亲、姐妹等)均不属于留守妇女的范畴。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湖北省钟祥市的留守妇女进行深度访谈。该地区目前约103万人口,其中钟祥籍在外务工人员有11万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1%^[52]。作为湖北省的县级城市,钟祥市区及下辖城镇地区(如郢中镇、长寿镇、客店镇等)大量劳动力外流,是留守妇女聚集的重要片区。且该市是研究者的家乡,因此各方面访谈条件相对成熟。在前期田野观察中,我们发现社交媒体是当前留守妇女生活的重要工具,为了更具体地考察该群体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研究结合线上和线下两种渠道在湖北省小城镇地区发放问卷。先在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制作链接,然后通过自己的关系网,找到第一批符合条件的研究样本后,后期以滚雪球的方式扩大问卷覆盖范围。在2019年7—8月期间发放了249份问卷,剔除14份无效问卷后,最终收回235份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及效果的问卷。数据证实76%的留守妇女每天使用微信的时间在4小时及以上,受访者普遍认同社交媒体丰

富了她们的生活。因此本文将结合生命历程理论,围绕社交媒体对小城镇地区留守女性的增权赋能这一主题,探讨以下三个问题:在生命历程视野下,如何看待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和媒介“弱视群体”的留守妇女?生命历程里哪些结构性因素影响了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在生命历程中,留守妇女如何借助社交媒体自我赋权,丰富留守生活?

一般而言,“线性主题”(Liner-Topic)的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样本数在28~40为宜,这样可以保证研究的集中度和有效性。^[53]在2019年7月及2020年12月,研究者以湖北省钟祥市为主要地点,深度访谈了自身社交圈里相对熟悉的10名留守妇女,并在她们的推荐下通过微信语音、电话、面谈等方式访谈了其余20名留守妇女。访谈对象共计30人,主要来自钟祥市郢中镇,年龄在20~59岁之间,大部分未接受高等教育,每位对象的访谈时长在1.5~3个小时。访谈主要围绕以下四个话题展开:留守妇女的生命历程、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社交媒体对留守生活的影响、哪些因素会影响社交媒体实践活动。为了获取更详尽的研究材料,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访谈员听取被访者的叙述,注意改进问题,以澄清或扩展回答^[54]。访谈结束后,调查人员通过仔细阅读访谈资料,包括访谈对象的情绪、语言表达以及肢体反应等一系列非提纲内容的潜在资料,对有问题或有价值的访谈内容进行追访,归纳出受访者的答案,然后依据本次研究问题以及相关概念进行编码,整理形成质性研究材料供后期分析使用。

三、研究发现

(一)留守妇女的多元身份及生命状态

“媒介弱视群体”涵盖了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媒介的选择性忽视,使得该群体处于更为边缘的位置^[5]。例如留守妇女、农民工、残障人士等“媒介弱视群体”,已有研究对其身份的无差别划分虽然强化了群体的特性,但忽略了该群体随时间等因素而变迁的多元化身份及生命状态。

学历和年龄是影响留守妇女生活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在留守妇女的整个留守生涯中持续存在。大部分留守妇女的原生家境一般甚至贫困,无力承担子女学业;同时很多家庭并不重视女性的教育,甚至会选择将有限的教育机会让给男孩,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在父母的安排下,一些女性选择较早结婚生子,自立门户,成为新生代留守妇女。文化知识结构的落后和技术能力的匮乏显著影响了她们的生活际遇,因此留守妇女通常选择赋闲在家全职留守,或选择从事技能要求较低的服务类工作(如超市导购、服装导购等)。然而,个体的年龄是获得服务类工作的隐性条件,小城镇的服务类工作通常将女性年龄限制在35岁以内。年轻、形象资本较好的女性才有机会获得有限的服务类工作;而随着年龄增加,35岁以后的留守女性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回落,更容易遭遇失业的风险。对于留守妇女而言,留守期间的职业危机一直存在。基于此,留守妇女被迫接受待业的现实,或通过亲缘关系和自身积累的经验重新求职。

受访者C女士今年30岁,半年前她还是一名蛋糕店店员,目前却待业在家照料孩子。早年间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差,她读完高中就恋爱结婚了,丈夫则外出工作,C女士成为一名留守妇女。结婚初期,C女士主要靠父母接济生活,后来生了两个儿子,经济压力变大,她只好选择外出工作。“因为没什么学历和技术,我只能做一些服务员之类的工作,我去商场卖过衣服,去超市当过导购,但都是打零工,根本没什么保障。”C女士深刻地体会到私人用工带来的弊端。后来家人给她介绍了现在卖蛋糕的工作,结果不到一年蛋糕店因为亏本就闭门歇业了,她继续在家待业了半年。“和私人打工特别不稳定,而且他们不会给你缴纳社会保险,只能靠我自己攒钱交。”访谈发现C女士的经历在留守妇女群体中非常普遍。当下亲缘用工模式容易带来一些问题,基于亲缘关系,老板不愿意让工人随便跳槽;对于工人来说,随意更换工作会使亲缘关系受到影响,因此女工们一般会选择忍让或接受一些不平等的用工条件。这意味着亲缘用工下非正规就业的留守妇女是在极度缺乏社会保障的环境中工作。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报告指出,作为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意味着低工资、少保障和高风险^[55]。

除非她们继续学习并通过正规单位的资格考试,或者自己缴纳社会保险,否则无法在退休后享受和正规单位一样的社会福利。

婚姻状况关系着留守妇女的生活质量,夫妻长期分居使留守妇女的婚姻容易出现危机,直接加剧了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难^[56],但对大多数留守妇女而言,离婚成本和再婚成本偏高;在父权制和从夫居的传统文化下,离婚时她们很难获得土地、房屋等重要财产,而娘家也没有了属于她们的土地和房产^[57],处于弱势地位的留守妇女难以争取到子女的抚养权,婚姻破裂即意味着骨肉分离。

受访者Z女士今年48岁,丈夫在外地跑运输,如今孩子已经25岁了。回忆起留守生活,她感慨夫妻分隔很容易出现感情矛盾,“因为我们两人每天接触的事情不一样,而且很多家里的事情没办法及时得到沟通,所以容易吵架,有几年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如今,Z女士已经度过了磨合期,也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她认为主要是因为有了孩子,而且离婚了自己也不好找对象,外人还会看笑话。如今她偶尔会和丈夫一起跑运输,或者等他退休回家,一家人团聚。因此,基于对纵向亲子关系和家庭整体利益的衡量,夫妻分居模式并不会对婚姻造成太大影响,大部分留守妇女的婚姻仍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然而这并不能遮蔽异地婚姻而导致的情感危机。在传统文化下,留守妇女通常会选择尽力维持婚姻关系:继续等待直至与丈夫团圆,或前往丈夫工作的地方从事阶段性的务工。

除此之外,家庭关系和家庭职责也是影响留守妇女生活的重要因素。婆媳关系一直是传统家庭矛盾的主要内容,一般通过分家来解决这一矛盾。分家是确立代际交换规则和家庭权力再平衡的一种模式。但由于留守妇女承担着照顾子女和赡养老人的职责,出于经济理性决策,留守妇女一般选择不分家,多和老人、子女共同留守^[58]。随着生命周期的推移,很多留守妇女同时需要照料三代人。因缔结婚姻时年龄偏小,生育期偏长,已经成为奶奶的留守妇女上有公婆需要赡养,下有未成年的子女需要照料,三代人的照料压力集于一身。因此她们或选择和老人生活在一起,或往返于城乡之间,在打工者和照料者之间多元身份交织,在家庭和工厂之间不断变换身份和职业。留守方式的选择是她们基于家庭关系和家庭职责的权衡后做出的理性决定。

受访者Z女士今年32岁,目前是一名超市收银员,和婆婆同住。她提到,“我的婆婆身体一直不太好,早年间她一个人住在乡下。”因此Z女士会选择一周回家一次,但近几年由于她婆婆的身体越来越差,Z女士需要照顾孩子和上班,因此无法及时回老家照料老人,只好选择把长辈接到自己身边同住。“平时白天我就在小区附近上班,做点零工,挣点生活费,下班了就去接儿子放学。”由于需要工作并照料家庭成员,Z女士的生活忙碌而紧张。

不同人生阶段个体承担的家庭职责不同,时间带来的是家庭角色的位移,也悄然改变了留守妇女的生命历程,是否留守、留守方式的选择等都会受到家庭职责的影响。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家的任意政策也会影响到个体的生活。她们的留守身份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是动态多元化的,交织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家庭分工中。随年龄而变换的不同人生阶段,她们可以是留守母亲、留守妻子、陪读妈妈等家庭角色,也扮演着服务人员、工厂女工、失业人群等社会身份,并在这些交织的身份中互相切换。

关于留守妇女身份的界定,最常见的是将留守妇女等同于农村留守妇女。既有文献总结了留守妇女身份的主要特征:留守在家、已婚、丈夫连续外出务工一个月以上。但没有根据留守的不同原因,区分出陪读留守妇女、哺乳期留守妇女、外来留守媳妇等多元化的子群体^[59],因此遮蔽了留守妇女多元化身份带来的差异化的生活状态。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媒介发展的背景下,留守妇女的媒介研究包含农村女性、城镇工厂女工、小城陪读母亲等群体。研究者通过对小城镇地区留守妇女的深度访谈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均有陪读的经历。但与以往研究不同在于,她们的家庭分工和个体身份是会发生变化的。一些受访者表示孩子高考结束后,她们会去城镇工作或者返回乡村照顾老人。因此,如果将“陪读母亲”视作她们同质静态的身份特征开展调查,则无法了解她们身份的多元化和留守状态的变迁。一些研究者采用留守妻子一词来突出群体身份^[60],但妻子这一身份无法完整揭

示她们作为女性工人、作为子女以及母亲的多重角色及留守状态,她们出于不同原因或在城镇留守兼业,或在乡村全职留守,或往返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呈现出多元变迁的留守状态。因此本文虽然选择关注“留守妇女”这一传统概念,但标识出了该群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婚龄较长、阶段性留守、家庭照料负担偏重以及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等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媒介弱视群体”的留守妇女,并非是不同的社会弱势群体简单相加的集合体。对该群体的分析,不能只聚焦某一种社会身份(留守妻子、留守母亲、失业人群等),更应关注该群体身份变迁背后蕴藏的能动性的因素,探寻个体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生活能力。媒介弱视群体并非弱者的集合,她们的社会身份是随时间或生活事件而动态变化的,她们的生命状态随身份变迁被改写。

(二) 流变的生命状态及差异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

由上文可知,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留守妇女的家庭职责和工作机遇不同,留守方式(留守时间、是否全职留守等)随之发生变化。不同的工作环境和家庭生活进而对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产生影响。一些服务类工作岗位规定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不允许玩手机,社交媒体只能用在添加客户、派单等工作类情境里。在工作场景中,社交媒体被当作工作辅助工具,而员工一旦被发现在工作中长时间玩手机,则会被扣除一部分工资作为惩罚。31岁的Z女士是某家超市的店长,她提到由于超市禁止上班期间玩手机,工作的时候她几乎不看手机,除非有供应商在微信上联系她关于送货的问题。“我们老板看见了不仅会扣我们的工资,而且还会批评我们,要是因为手机怠慢了来超市的客人,也会被投诉的。”其他受访者也表示社交媒体只能用于工作场景里。为了适应留守妇女的生活节奏和家庭情况,一些招聘留守妇女的用人单位也会灵活地制定员工管理条例,留守妇女可以协调好工作和家庭生活,包括何时何地接触社交媒体;另外一些独居或与子女居住在一起、家庭氛围轻松的留守妇女相对可以更自由地接触社交媒体。受访者D女士40岁,目前是一名电子厂质检员,她提到由于工作单位管理比较人性化,在休息的时间,她会和同事一起看抖音或快手视频,如果家里遇到特殊的事情,自己可以随时和老板请假回家,用人单位直接在工资里扣钱。对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她觉得很满意,并补充道“我回家处理完事情,其余的时间都可以自由地选择看手机或者玩游戏”。

工作之余,家庭生活是留守妇女的重中之重。家庭亲密度较高的留守妇女会经常和家人视频、语音,一些年轻独居的留守妇女可以自由安排空闲时间。但家庭照料负担较重或家庭环境相对约束的留守妇女较少使用社交媒体,例如传统性别文化规范规定了女性的主要活动领域,即“男主外,女主内”这一条男女有别的隐性原则,限定了女性的活动范围主要应在家庭,一旦女性超越了家庭的界限,就可能遭到非议。^[61]访谈发现,一些和婆婆住在一起的被访者,绝大部分都会选择服从性别文化规范,适当减少社交娱乐活动。超市店长Z女士在受访时感慨万分,她说自己原本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人,微信上有很多朋友群,以前下班后她会经常约朋友出去玩,但后来Z女士的婆婆和街坊邻居会觉得不妥,她只好减少外出聚会的频率,下班后选择在家玩手机看小说。

相较青年女性,中年留守妇女承担主要家庭责任,无暇花费太多时间在手机娱乐上,而倾向于借助社交媒体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访谈中发现中年留守妇女较多使用社交媒体获得收益,她们更像是高效发挥社交媒体价值的“智慧主妇”,而不会在社交媒体的娱乐中浪费过多的时间。例如50岁的X女士和L女士目前住在市区,主要为了陪伴孩子学习。X女士的丈夫在乡镇经营自家葛粉店,业余时间,X女士主要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推销葛粉生意,除了用社交媒体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获得经济收入,补贴家用;L女士主要在家长群中了解子女的教育信息,另外为了节省生活开支,她可以熟练地使用拼多多APP,淘到高性价比的生活用品。

然而,社交媒体可以丰富留守妇女的生活,却无法改变政策制度性因素对她们生活的影响。在当前学区制度的背景下,村办学校生源萎缩,由于大多延聘退休教师上课,很多课程落后且无法维持,一些村镇的学校甚至面临关闭。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的留守妇女迁居到

城镇,成为陪读母亲,她们租住或定居在学校附近,以照顾子女为主业,并在居住地附近的工厂等非正式单位做零工,补贴家用,但留居在家中的老人逐渐老去,赡养老人的问题提上日程。因此,这些留守妇女会往来于城镇和乡村之间,或者三代同堂居于城镇。附属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资源配置强化了留守妇女的弱势地位,加重了她们的生活负担。访谈发现,很多留守妇女预计等子女去读大学后,可以和老公一同外出务工,但赡养老人的责任通常需要她们继续留守,由于没有固定的用人单位负担稳定的社会保险,缺乏养老退休金的她们普遍表示生活压力比较大。另外,小城镇地区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子女升学的压力也是陪读妈妈们内心深处的隐忧。

40岁的F女士是一名陪读母亲,由于乡下学校教学质量不好,她在城里买了房,陪孩子在城里读书,平日F女士顺便在一些酒店做零工。当下最牵动F女士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她提到,“孩子现在成绩一般,城里高中竞争激烈,也不知道儿子能考上什么水平的大学。”因此,陪读妈妈们会根据工作和家庭情况调整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一些留守女性倾向关注积极乐观的媒介信息,主动避开负面消极的内容,比如阅读或转发微信订阅号里一些心灵鸡汤、搞笑段子等文章;在与家人的沟通方面,她们纷纷表示通过与远距离的亲人表达情感关怀可以平复内心的焦虑,在有限的沟通中传递更多的温暖和关爱才是在留守困境中应该秉持的生活态度。38岁的G女士是一名留守妇女也是陪读妈妈,因为担心打扰孩子学习,平时在家她基本不会经常看手机,除了定时安排孩子与丈夫视频外,她也很少和丈夫讲太多不开心的事情,在她看来,传递太多负面情绪是徒劳的,家人之间的互相鼓励可以形成一种“能量场”,有助于排解精神压力解决实际困难。留守妇女们深知自身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人口政策中的弱势地位,在无力改变宏观政治环境的现实下,她们寄情于积极向上的媒介内容,在社交媒体中传递温暖的力量携手同行。

不同的留守状态导致了差异化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其中,工作环境和家庭生活是核心的影响因素。留守妇女的工作性质能直接影响她们社交媒体的使用,一些工厂严格的流水线作业模式限制了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而另一些人性的用人单位采用“客厅即工厂”的生产模式^[62],因此,一些留守妇女会选择边工作边和家人视频或语音聊天,缓解精神压力。家庭生活是另一个影响留守妇女社交媒体使用的重要因素。青年留守妇女初建家庭,家庭压力较小,更多地出于娱乐的目的使用社交媒体。但传统的性别规范限制了女性的社会交往,青年留守妇女社交媒体使用行为会受到婆婆限制。随年龄增长,留守妇女的照料负担加重,需要同时照顾子女和赡养老人,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她们利用社交媒体从事廉价的社会劳动补贴家用,精选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节约家庭开支。个体化的解决方案保证了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此外,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生命政治影响了留守妇女的家庭生活。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匮乏,留守妇女们不得不在城镇的学校旁边租房陪读,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向老师了解孩子的学业情况,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社交媒体影响孩子学习。在外部政策环境下,留守妇女主动调整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获得生活的正能量。

(三) 变迁的生命阶段与社交媒体赋权实践

社交媒体深入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种类越来越丰富,不同产品展现出各自的特点。而对于留守妇女这一群体而言,研究发现她们长期与丈夫分居,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社交媒体的重要功能在于帮助她们获得社会支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社会支持理论的讨论众多,Sidney认为社会支持提供的不是商品和服务,而是一种影响,使得被支持人在生活中感到被关爱、受尊重、有价值,从而使他们相信自己从属于一个温暖的社会群体,相互间负有责任,增强其自主生活的能力。^[63]社会支持大致可分为四类:①情感支持,如同情、关心、情感等;②信息支持,向对方提供建议与指导;③物质支持,向对方提供资金、物资以及具体的服务;④陪伴支持,陪伴对方参与某些社会活动。^[64]这部分主要探讨不同人生阶段的留守妇女如何借助社交媒体获得社会支持,实现自我赋权。

1. 释放分离之苦:社交媒体与情感支持

年纪尚轻的留守妇女刚刚步入婚姻就面临与丈夫的分别,内心充满不舍,当生活遇到困难时,首

先会选择与丈夫联系,向丈夫诉说内心的苦闷。很多受访者反映她们几乎每天都要和丈夫微信视频,每次视频的时间在1~2个小时,视频的时间和地点不确定;有些受访者表示刚开启留守生活时甚至期望和丈夫时刻保持联系的状态,来自丈夫的情感支持明显能够缓解留守妇女的负面情绪。28岁的受访者Z女士是一名教师,刚开始留守生活,她说自己每天都要和丈夫微信视频,哪怕没有话讲,也要开着微信视频。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为情感交流带来了便利,即使丈夫不在身边,通过社交媒体的实时交流依然可以让留守妇女体会到夫妻团聚的感觉。社交媒体凝聚了夫妻关系,但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个人的隐私空间,给家庭成员产生一定的压力和限制,即“交流的压力”。经过夫妻双方的沟通,留守妇女与丈夫逐渐共建远距离的信任机制,调整并确定夫妻异地相处的模式。很多青年留守妇女提到,丈夫会觉得频繁的微信视频挤压了彼此的空间,容易激发彼此的矛盾,因此不少留守妇女会逐渐调整沟通的频率,由无时无刻的联系转向仪式性的情感交流。

受访者C女士如今33岁,在谈到与丈夫相处的经历中,她认为自己如今习惯了夫妻异地的生活,不再像留守初期那样严格规定视频的时间。与家人的相处方面,她补充说:“我觉得夫妻之间需要一定的空间,如今我在微信上组建了家庭群,约定仅周日和家人一起视频,节假日会在群里发红包寄礼物,现在家庭成员的感情更好了。”情感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一部分,在情感支持方面,良好的夫妻关系有助于提升留守妇女的幸福体验。由于事业的发展 and 追求个人梦想,年轻夫妻初建家庭就面临分别,容易出现情绪起伏,她们更渴望与丈夫时刻保持联系,通过诉说释放情绪和压力,良好的夫妻感情和频繁的社交联系是支持留守生活的重要因素。

社交媒体有助于夫妻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丰富了青年留守女性的其他社会关系,辅助她们搭建独立自主的社交网络。例如在工作群、社交群中,一些青年留守妇女会主动寻找有同样留守经历的同事、朋友,并从线上社群延伸至线下社交,在现实的沟通和陪伴中获得心理安慰,形成情感共同体。访谈发现,很多青年留守妇女在微信群中发现了和自己一样有留守经历的人,曾经彼此陌生的她们因为相似的经历而成为朋友,在彼此的分享和鼓励中纾解负面情绪。受访者F女士30岁,她平时在家附近的超市或酒店打工,在同事群中,她认识了很多和自己一样留守在家的妇女,并结识了一些朋友。“比如我认识的W女士,她比我小3岁,但孩子和我儿子是同学,于是我们加了微信,时常约定下班一起接孩子,平时休息时也会聚在一起聊一聊孩子教育、家庭和养老的问题。”朋友间的陪伴可以缓解F女士的心理压力。

此外,在社交媒体上阅读和制作轻松娱乐的信息内容也是青年留守妇女情感调节的主要方式。受益于无线网络的方便快捷,很多受访者反映自己在业余时间会热衷看抖音视频、快手视频等短视频APP,或者在微信订阅号中看一些搞笑的软文,通过阅读这些轻松愉快的媒介内容明显可以疏导内心的苦闷。短视频平台凭借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精准推送,根据留守妇女的偏好,不断推送相似的内容,因此可以满足她们即时性、碎片化的情感需求,在指尖轻触屏幕的瞬间,释放负面情绪;一些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留守妇女则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尝试开通网络直播,或制作微视频发布到网上,在直播间里与评论台下,获得情感支持。

2. 维系日常生活:社交媒体与信息支持

作为家庭的中坚力量,中年留守妇女的生活境遇更具挑战性。随着年龄渐增,她们的照料负担加重,通常需要同时照顾老人和子女,并且面临着一定的经济压力和职业压力。维系日常生活是这一阶段的留守妇女普遍面临的主题。因此,相较青年留守妇女对情感支持的强烈需求,大部分中年留守妇女更渴望获得实际的支持,如经济上的补贴,家庭劳务上的扶持等。社交媒体便成为她们获得信息支持,解决生活的难题,缓解生活压力的重要工具。

留守妇女需要照顾老人和子女,也需要完成工作,兼顾工作与家庭消耗了个体有限的精力。因此除了工作需求和家庭沟通外,她们很少有时间花费在社交媒体的休闲娱乐上,对社交媒体的使用

更具有目标性。例如需要抚养两个儿子的L女士,平均一周才会和丈夫微信视频,平时基本不打电话,大儿子在外求学,小儿子即将上高中,目前她的微信里已有五个家长群,查看群内的教育信息是她每天需要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她还在工厂务工,因此除了借助社交媒体与丈夫沟通外,她很少花费时间在社交媒体的娱乐上。和L女士一样,35岁的X女士是一名陪读妈妈,她表示平时只要孩子在家,自己基本不玩手机,因为怕影响孩子学习,业余的时间主要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教育、生活类信息,了解当下社会形势,有助于辅助孩子学习和成长。

因为生活压力,中年留守妇女基于娱乐目的使用社交媒体变少了,而工具性地使用社交媒体变多了。Q女士是一家私人美容院的老板,育有两个女儿,生意有时比较忙,她很少会花费时间在社交娱乐上。通常她会和顾客建立相对密切的社交联系,借助朋友圈和微信群推荐一些新的美容产品。J女士有一个儿子,现在正在读高中,除了陪伴孩子,J女士有时会在商场做促销员,有时会在超市担任导购员,总之会选择相对清闲的工作,方便接送孩子。上班期间,除了忙工作,她会经常逛逛论坛和贴吧(例如钟祥论坛),了解当地就业信息等。

中年留守妇女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擅长使用社交媒体帮助打理自己的生活。观察发现,她们通常熟练地在网上挑选性价比较高的家用物品,如视频直播平台、小红书APP、拼多多等社交类APP,借助社交媒体节约生活成本。同时,她们会尝试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做微商或从事网络销售活动,以此来补贴生活。甚至还有一些留守妇女通过社交媒体学习投资知识,打理家庭财务。受访者L女士45岁,是一名全职留守妇女,她提到自己不会将全部储蓄放在银行,因为利息相对较低;而根据社交媒体的推荐,现在网上有很多理财产品,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安全系数也比较高。社交媒体的使用增加了女性相对资源占有量,实现女性在自我认知、情感表达、个人能力提升、自我实现等方面的目标。结合访谈,我们发现借助社交媒体打理财务提升了留守妇女的经济地位,增强了她们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她们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女性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在家庭权力关系中逐渐脱离边缘地位。

3. 重拾情感寄托:社交媒体与陪伴支持

随着子女长大,除了与丈夫分隔两地,留守妇女还需面临与子女分离的现实。小城镇地区的高中毕业生一般远离家乡求学,毕业后则选择留在外地工作。与家人长期分隔通常会导致一些留守妇女出现一定程度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已有研究发现,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密切联系,社会支持水平越低,其抑郁程度越高,睡眠质量越差^[65]。逐渐被子女和时代“抛弃”的中老年留守妇女在信息时代充满恐慌和焦虑,缺乏陪伴支持。为了缓解内心的孤寂,重拾情感寄托,留守妇女开始渴望回归夫妻团聚的生活,因此会频繁地与丈夫微信视频;其次,相对充裕的业余时间使留守妇女可以广泛地阅览社交媒体上的信息,通过与亲人分享信息获得与亲人的情感连接。例如50岁W女士的女儿如今已经成家立业,女儿和丈夫通常一年才回来几次,女儿的远去使得W女士更渴望夫妻团聚:“我的社交圈很窄,微信上联系最多的就是我老公,因为女儿有自己的生活,平时我经常转发一些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到家庭群里。”L女士的大儿子和G女士的儿子在外求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们通常会找一些临时工作,其余时间就会玩一些手机小游戏,看一些厨艺视频。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关注的内容基本围绕着经营婚姻家庭、子女身心健康的家庭议题。G女士提到:“虽然一个人在家,也不能随意打扰孩子的生活,除了和我老公视频,我会在今日头条上转发一些心灵鸡汤或者养生类的内容给我老公或孩子。”在社交媒体中转发家庭议题的网络链接,留守妇女借此表达内心的牵挂,也寻找到自身对家庭的意义。有些留守妇女目前依然承担着隔代抚养子女的任务,由于需要照顾孙子女,她们无暇玩手机,而为了避免代际育儿的观念冲突,她们通常会抽空在网络上积极学习抚育孩子的经验,包括健康饮食、教育前沿等信息,也会陪着孩子玩抖音、看直播。

除了有回归夫妻团聚的渴望,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幸福美满的生活是这一阶段的留守妇女自我满足的来源,她们常常在微信朋友圈上展现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来自朋友的点赞或评论增强了她们

的自我认同感。

“我在朋友圈一般都会发一些家庭团聚的照片,或者孙子健康成长的片段,我不喜欢发一些不高兴的内容。一来没什么作用,还容易惹别人看笑话;二来身边的亲人还会担心我会出什么事,倒不如发一些开心的视频。”(A女士,51岁,全职留守)

“我最大的快乐来自家庭幸福,现在我的两个孩子学业有成,我也算熬出头了。每次他们回家我们都会自拍一些照片,有时候会发到朋友圈,我老公和朋友会和我点赞。虽然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挺辛苦的,但看到朋友圈开心的一家人,我觉得很自豪。”(X女士,50岁,个体户)

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提出“前台”和“后台”。所谓前台,便是“个体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是“个人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所谓后台,便与之相反,是“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有损于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66]对于前台和后台的操纵,便是所谓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67]这一阶段的留守妇女通过使用朋友圈呈现自己的生活状态而获得自我认同,在内容方面主要呈现自己幸福和乐的家庭生活或是外出旅游的幸福瞬间。例如久违的夫妻团聚、子女结婚、乔迁之喜、孙子或孙女的平安出世或者自己在外旅游的风景照、享受生活的片段,通过社交媒体向朋友展示良好的家庭氛围。

总之,不同人生阶段的留守妇女借助社交媒体获得不同程度的社会支持:青年留守妇女与丈夫分隔两地,夫妻团聚让步于事业发展,因此更渴望得到丈夫与家人的情感陪伴;随着照料压力的增加,留守妇女更渴望从媒体中获取信息支持,辅助生活;步入中老年,子女逐渐离开原生家庭,虽缓解了留守妇女的生活压力,但代际分隔的不适应与长期的留守生活使留守妇女意识到家人陪伴的重要性,她们开始重新期望获得丈夫的情感陪伴,恐惧被家人“遗忘”。留守妇女独自留在家乡,与丈夫长期分离,缺少与他人沟通、倾诉的渠道,而社交媒体增加了留守妇女与他人的联系与互动。一方面,留守妇女通过社交媒体与丈夫保持联系,维系夫妻感情;另一方面,留守妇女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接触具有同样生活经历的朋友,减少孤单感。在留守妇女步入中老年后,子女不在身边,社交媒体又成了与子女沟通的重要工具。留守妇女的需求借助社交媒体得到满足,社交媒体丰富了她们留守生活,更凸显了个体在留守生活中的主观能动性。她们不再是独舞于阡陌之间黯淡的身影,更是往来于城乡之间的一抹彩霞。借助社交媒体沟通、娱乐等功能,留守妇女是有力量的弱者。

四、结论和讨论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生命历程理论指向一种对于人类生命多层次的社会研究模式,强调个体、历史与社会的交互关系^[40]。Giele等总结了生命历程分析的四大基本原理:时空配置、相互联系的生命、主观能动性、恰当的时间^[68]。在这四个原则相互作用下,个人和历史社会之间构成互动关系,形成不同的生命体验。本文选取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工具性的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回答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与其所处时空情境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一是借此丰富对社会弱势群体、“媒介弱势群体”的理解;个人所处不同的生命阶段,其人生际遇百转千回,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规范等一些结构性因素;但当我们以家庭身份划分社会群体,并调查特定的社会群体时,就会忽略该群体变化的社会身份和生活际遇。二是基于质性分析发现工作和家庭角色分工等情境性因素形塑了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赋权实践。例如留守妇女根据家庭和工作要求减少社交媒体娱乐或社交活动,倾向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改善经济状况等。三是发掘了留守妇女在社交媒体赋权中的主观能动性。面对结构性的现实困境,她们并非全然是失落、无助的弱者,而是积极调整社交媒体使用状态,增加联系和互动,获得社会支持,实现赋权。年轻的留守妇女通过社交媒体得到来自丈夫和朋友的情感支持。孩子出生后,留守妇女生活重心发生改变,对丈夫的依赖开始转向照顾子女和赡养老人。由于需要承担较重的经济压力和抚养、赡养重担,这一阶段,留守妇女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支持。随着子女的长大和辈分更迭,子女们逐渐离开原生家庭,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妇女

的生活压力,分离的不适应和长期的留守生活使得留守妇女利用社交媒体获得陪伴支持。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现实启示。一是通过提升留守妇女的媒介素养,辅助她们合理使用社交媒体。随着新媒体技术向社会中下阶层渗入,留守妇女有了利用社交媒体实现自我赋权的可能性。但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的留守妇女在社交媒体赋权方面存在差异,社交媒体带来的既可能是数字赋权,也可能是数字鸿沟。已有研究发现,不同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的群体在数字技术使用上有显著差异^[69]。在留守妇女群体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有较强数字化生存能力的留守妇女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发展电商,辅导孩子学习,维护家庭关系。而一些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留守妇女只能使用手机的基本通信功能,社交媒体的赋权也就无从谈起。另外,部分留守妇女由于沉溺社交媒体而耽误正常工作、偏信网络诈骗信息等导致“减权”。因此,针对留守妇女开设媒介素养等公益课程,提升她们的社交媒体使用能力尤为必要。二是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应该加强对留守妇女的社会援助。调研发现,虽然钟祥市是留守妇女聚集的重要片区,但妇联及其他妇女组织对留守妇女的生活参与程度低,留守妇女群体内部的互动少。甚至,如果留守妇女将社交媒体用于扩展社交圈,还可能遭到来自家庭的阻挠。因此,留守妇女的社交媒体使用主要还是用于自我娱乐及维系亲情。然而,大多留守妇女都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如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缺少家庭投资理财知识,婆媳之间存在矛盾等等,仅凭留守妇女个体及其家庭难以完全解决这些难题。其他组织机构应借助社交媒体为留守提供更多援助。社会援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和技能上的帮扶。例如通过出台政策支持留守妇女发展电商,提供线上工作技能培训、工作信息推荐、家庭关系维护咨询等多种形式解决她们的实际问题。同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可以牵头,组建当地留守妇女微信群、QQ群,形成留守妇女的在线社群,实现留守妇女们的互帮互助,让留守妇女从多元途径获得社会支持。

本文探讨了湖北省小城镇地区的留守妇女生命历程和社交媒体赋权实践,结合30名留守妇女的心路历程得出相关结论,但由于未调查留守妇女家人(如丈夫、子女)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研究的外部效度和研究范围有限,未来需要更深入和广泛的调查来丰富该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滑明达. 电视屏幕上弱势群体的形象及其影响——80年代以来美国电视研究评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9, 2: 76-81.
- [2] 孙卫华. 媒介关于“弱势群体”报道方式的思考——兼谈新闻传播者的责任. 新闻界, 2006, 4: 22-23.
- [3] 钱再见.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江海学刊, 2002, 3: 1.
- [4] 宋颖慧, 管成云. 新媒体赋权与农民工城市化发展的个案研究. 新闻大学, 2020, 4: 66-83+121.
- [5] 路俊卫. 弱势群体与传媒“弱视”. 当代传播, 2004, 6: 81-82; 82-83.
- [6] S. S. Ping, J. L. Qiu. The New Media Cultures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London: Routledge, 2016: 93-104.
-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02-03). [2021-04-21] http://cnnic.cn/gwym/xwzx/rdxw/20172017_7084/202102/t20210203_71364.htm. pdf.
- [8] 段成荣, 程梦瑶, 秦敏. 剧变中的我国留守妻子及其学术与公共政策含义.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6: 19-20; 21-24.
- [9] 汪淳玉, 叶敬忠. 乡村振兴视野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特点与突出问题. 妇女研究论丛, 2020, 1: 17-55.
- [10] 许传新. 农村留守妇女研究: 回顾与前瞻. 人口与发展, 2009, 6: 54-55; 56-59.
- [11] 吴惠芳, 叶敬忠. 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3: 138-147.
- [12] F. Clausen, E. Sandberg, B. Ingstad, et al. Morbidity and Health Care Utilisation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Mmankodi

- Village, Botswana.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2000, 54(1):58-63.
- [13] 封立涛,刘再起. 湖北留守妇女形成原因分析——基于理性选择.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1:35-39.
- [14] 王俊文.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留守妇女”问题研究——以江西省井冈山市 A 镇为例. *社会科学辑刊*, 2011, 1:61-63.
- [15] 刘筱红,施远涛. “四化同步”发展下留守妇女家庭离散问题治理研究——基于中西部六省农村的实地调查. *人口与发展*, 2014, 1:81-89.
- [16] 梁洪松, Y. Tang, 霍学喜. 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4:114-121.
- [17] 林云飞. 社会转型下农村留守妇女权益的保障. *人民论坛*, 2012, 36:156-157.
- [18] C. Luo, X. Yang, S. Li, et al. Love or Bread? What Determines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China. *Gender Issues*, 2017, 34(1):23-43.
- [19] 董小玉,洪亚星. 农村留守妇女的媒介形象建构. *当代传播*, 2015, 3:25-27.
- [20] 陈树强. 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 *社会学研究*, 2003, 5:72-73;74-83.
- [21] B. Mehra, M. Cecelia, A. P. Bishop. The Internet for Empowerment of Minority and Marginalized Users. *New Media & Society*, 2004, 6(6):781-802.
- [22] 范斌. 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 *学术研究*, 2004, 12:73-78.
- [23] 丁未. 新媒体与赋权:一种实践性的社会研究. *国际新闻界*, 2009, 10:76-81.
- [24] 侯志阳. 新媒体赋权与农村绿色社区建设. *学术研究*, 2016, 4:66-71.
- [25] E. M. Rogers, A. Singhal. Empowerment and Communication: Lessons Learned from Organizing for Social Change.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3, 27(1):67-85.
- [26] 黄月琴. “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 *新闻记者*, 2015, 4:28-35.
- [27] O. Kehinde, N. Okorie, F. Omole, et al. How Sociable are Women on Social Media? An Experiential Study on Nigerian Wo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2014, 4(2):57-72.
- [28] D. Goh. Who We Are and What We Want: A Feminist Standpoint Approach to Defining Effective ICT Use for West Virginian Wome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3, 16(7):1019-1041.
- [29] V. C. Luisa, A. V. Bosch, A. R. Catalan. Motives for Usi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s Social Capital. *Revista Icono 14-Revista Científica De Comunicación Y Tecnologías*, 2015, 13(2):142-162.
- [30] G. M. Chen. Why Do Women Bloggers Use Social Media? Recreation and Information Motivations Outweigh Engagement Motiva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2015, 17(1):24-40.
- [31] N. Zhang. Performing Identities: Women in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oforum*, 2014, 54:17-27.
- [32] Y. Wang, J. Sandner. Like A “Frog in A Well”?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Chinese Rural Women's Social Media Practices Through the WeChat Platform.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9, 12(3):324-339.
- [33] C. Wallis. Micro-Entrepreneurship,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Gender in Rural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5, 8(1):42-58.
- [34] W. Harcourt. Using the Master's Tools: Women's Movements and Social Media. *Media Development*, 2011, 58(1):19.
- [35] S. Wyche, J. Olson. Gender, Mobile, and Mobile Internet Kenyan Women's Rural Realities, Mobile Internet Access, and “Africa Ri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8, 14:15.
- [36] G·H 埃尔德. 大萧条的孩子们. 和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426-429.
- [37] 包蕾萍. 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 *社会学研究*, 2005, 4:120-133.
- [38] 郑作彘,胡珊.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社会学研究*, 2018, 2:214-246.
- [39] V. L. Bengtson, K. R. Allen.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pplied to Families Over Time//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Springer, Boston, MA, 2009:469-504.
- [40] G. H. E. Jr.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4, 4:10;11-15.
- [41] 林瑜胜. 拒绝与吸引:农村留守老人宗教信仰选择机制. *山东社会科学*, 2017, 8:107-112.

- [42] 李梅,杨汇泉.农村留守女童反社会行为生成的现象考察——邓军“买处”个案的生命历程理论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1:87-96.
- [43] 刘凌,吴蕾.“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育儿选择影响的研究.学习与探索,2019,3:28-34.
- [44] 吴惠芳,叶敬忠,刘鹏.农村留守妇女与宗教信仰.农村经济,2010,1:108-111.
- [45] 黄岩,胡侦.外发工厂:拆分型劳动体制下留守女工的兼业生产.妇女研究论丛,2020,1:26-35.
- [46] 李小云.“守土与离乡”中的性别失衡.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1:17-19.
- [47] 邢成举.村镇工厂与农村女性反贫困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1:47-55.
- [48] 郑欣.人生规划与媒介驱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2:66-70.
- [49] M. Browning, T. F. Crossley. The Life-Cycle Model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3):3-22.
- [50] 章玉萍.手机里的漂泊人生: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女性数字媒介使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7:49-65+127.
- [51] C.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6-7.
- [52] 赵超.政府包车!129名钟祥籍在外务工人员踏上返岗路途.掌上钟祥,2020-03-18.[2021-04-21] https://www.sohu.com/a/381173692_770497.
- [53] J. F. Gubrium, J. A. Holstein.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 Metho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13-26.
- [54] H. Arksey, P. T. Knight. *Interview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An introductory Resource with Exampl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9:7.
- [5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Measuring Informality: A Statistical Manual on the Informal Sector and Informal Employment*//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witzerland, 2013. [2021-04-01] https://scholar.google.com/hk/scholar?hl=zh-CN&as_sdt=0%2C5&q=Measuring+informality%3A+A+statistical+manual+on+the+informal+sector+and+informal+employment&btnG=.
- [56] 项丽萍.农村留守女:一个值得关注的弱势群体.广西社会科学,2006,1:176-177+180.
- [57] 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0,4:151-165+223.
- [58] 姚俊.“不分家现象”:农村流动家庭的分家实践与结构再生产——基于结构二重性的分析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3,5:78-94.
- [59] 汪淳玉,吴惠芳.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困境留守妇女.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93-100.
- [60] 段成荣,秦敏,赖妙华.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人口学刊,2017,1:5-17.
- [61] 高修娟.从一个妇女主任的遭遇看村落性别规范.妇女研究论丛,2011,1:40-46.
- [62] 熊秉纯.客厅即工厂.蔡一平,张玉萍,柳子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52.
- [63] C. Sidney.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or of Life Stres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76, 39(5):300-314.
- [64] M. Dafaalla, A. Farah, S. Bashir, et al.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Arabic MOS Social Support Survey. *Springerplus*, 2016, 5(1):1-7.
- [65] 顾红霞.农村留守妇女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现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1:47-49.
- [66]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9-97.
- [67] 张丽萍.媒体人微博:“前台”“后台”的错位.新闻记者,2012,3:93-94.
- [68] J. Z. Giele, G. H. Elder. *Life Cours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A Field*// J. Z. Giele, G. H. Elder. *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98:5-27.
- [69] J. V. Dijk, K. Hacker.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3, 19(4):315-326.

The Power of the Vulnerable Group: the Social Media Empowerment Practice of Left-behind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Shi Yibin, Qiu L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ines life course theory and social media empowerment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the social media empowerment practice of left-behind women. The paper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e survey results show that left-behind women not only play family roles as left-behind mothers, left-behind wives, but also play social identities such as factory workers and unemployed people. They switch dynamically among multiple identities. Macro-social economy,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other structural factors have changed the life experience of left-behind women. Th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 expectations of work and family have shaped their social media empowerment practices. Young left-behind women favor social media for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but they are restricted by work and gender cultural norms. Middle-aged left-behind women are busy taking on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cannot spend too much time on social entertainment. Middle-aged left-behind women tend to use social media to solve life problems. Although left-behind women are considered as vulnerable group,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helpless and weak. Instead, they actively try to use social media to adjust their emotions, assist their lives, gain self-identity, and ultimately enrich their left-behind lives in different life stages.

Key words: vulnerable group; social media empowerment; life course; left-behind women

■ 收稿日期: 2021-02-01

■ 作者单位: 石义彬,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邱立,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 责任编辑: 汪晓清